

初亮的星系

——女性文學史論述的觀察與檢討

◎ 楊 翠

2001年，台灣文學史書寫邁入一個新的紀元，標幟這個新紀元的則是混雜、喧嘩、對話、論辯等景觀，台灣文學史書寫可謂眾聲齊出，互與爭鋒。從現象面觀察，在2001年，台灣文學史書寫已然成爲一個繁鬧的論述場域；這些論述固然大多是以文學論述的形式呈現，然而，我們卻無法否認其間雜揉著複雜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的權力關係。

性別，也是2001年台灣文學史書寫的一個高階混音。女性文學史書寫，自然隱含著對既有性別文化政治的反省，同時亦必將觸及關於文學史知識建構的權力政治。2001年台灣女性文學史書寫的概況，大致可以從出版、博碩士論文、學術研討會等三方面進行觀察與討論。

在學術研討會部份，2001年所舉辦的台灣文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中，若排除兒童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部，女性文學相關研究有二十餘篇之譜，議題分佈頗見廣泛，關於「文學史」論述、重構、論辯等相關討論亦已浮現。如邱貴芬連續發表了〈日據以來台灣女性小說導讀〉（元智大學：新世紀華文文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五月）、〈落後的時間與台灣歷史敘述〉（政大：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



圖 9 百年台灣女性文學版圖研討會。（淡江中文系提供）

會·六月），此二文的發表，具有相當重要的時間性意義，因爲就在七月，由她所主編的《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出版了。此外，范銘如的〈扳轉時空魔術方塊——一九〇年代台灣女性小說〉、陳俊啓的〈朱天心的身分、認同與主體性——兼論八〇年代台灣小說的發展〉、何寄澎的〈孤寂與愛的美學——綜論簡媜散文及其文學史意義〉等，都同時觸及了台灣文學史／女性文學史的相關論題。

2001年3月8日，由淡江大學與自由時報主辦的「百年台灣女性文學版圖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舉行，與會者有李元貞、邱貴芬、江文瑜、應鳳凰、范銘如、簡瑛瑛、張小虹、封德屏、胡品清、季季、袁瓊瓊……等，網羅了創作、研究、媒體等重要的女

性文字工作者，是女性文學書寫／研究版圖的一大盛事，也同時揭舉出女性文學史書寫的重要性與相關課題。會議共分三場，分別標舉「女性文學團體的運作與功能」、「文學創作的幕後女性推手」、「跨越文類與文化鴻溝」等三大議題。邱貴芬的引言清楚指出這次座談會的關懷基調與思考向度：「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成爲眾所週知或眾人公認的『文學作品』並非只取決於『作品好不好』這樣一個條件，文化生產領域種種機制的運作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機制包括文藝政策、主流意識形態、媒體出版管道、文學獎評審機制、文學團體的角力關係等等。」（引自網頁<http://mail.tku.edu.tw/fanmj/index.htm>）而主辦的淡大中文系范銘如也指出：「這次的研討會，主要是回顧二十世紀百年來台灣女性文學對文壇的貢獻，與女性文學創作的研究，期許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展望作討論。」（引自淡大網頁<http://mail.tku.edu.tw/fanmj/index.htm>）這次座談會並未以學術研討會性質舉辦，它在「版圖」（過去·現在·未來）的宣示性意義、以及女性文學書寫／研究／媒體社群的整合性意義方面而言相當重要。

在出版方面，以性別的角度介入

台灣文學史論述者，由邱貴芬所主編的《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是2001年最重要的一部書。邱貴芬長期關注台灣女性文學，著力於探究女性作家與時代的繁複對話線圖，也藉由對女性文學的研究，辯證台灣文學史觀，同時辯證性別與國族論述的關係。邱貴芬早在1992年前後，即以銳利的筆觸，從事台灣女性文學的研究。1997年，出版《仲介台灣·女人》、1998年出版《（不）同國女人聒噪》，其後更著力於女性文學史書寫的論辯，企圖揚棄男性觀點，重讀並重估台灣女性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出版於1997年的《仲介台灣·女人》，是邱貴芬思辨文學史相關議題，並企圖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史的先聲。

邱貴芬長期以《中外文學》爲主要發聲管道，鏗而不捨地討論文學史相關問題，她的論述策略主要是以性別文化批判觀點，對現有兩部文學史著：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的史觀進行檢討與批判，反證女性文學史書寫的意義，並建構女性文學史書寫的「史學方法」。如發表於一九九九年的〈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指出，由於「台灣當今主流台灣史著作」對台灣文學史的定義與基調，以及女

性小說與主流媒體的關係密切，致使數量極其豐沛的女性小說無法入史。發表於2000年的〈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再次檢討了葉、彭兩位先生的文學史著，以及陳芳明未完成的《台灣文學史》部份篇章，指出以「反殖民」為統攝概念的文學史敘述，難脫將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後現代風格等體類文學邊緣化的論述取向，主張以「現代性」取代「反殖民」做為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概念線索。在此論述中，邱貴芬已浮現出以「全球化」論述來開展台灣文學史敘述的企圖。凡此種種，都是邱貴芬亟欲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史的階段性工作，這項工作的初步整合性成果，即是出版於2001年7月的《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

《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規劃選錄二十一位日治以來的女性作家小說作品，其中郭良蕙的《心鎖》因故從缺，而潘人木、聶華苓、邱妙津、蔡素芬、李昂等五位作家的作品則因過長而予以節錄，每篇並搭配一篇作者簡介及一篇作品導讀（包括從缺的《心鎖》在內），因此囊括了二十一人次的研究者進行引介及導讀工作。《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

確實結合了跨世代、跨學科、跨族群的眾多女性文字工作者，包括女性小說創作者與女性文學研究者，再經由邱貴芬執筆的導論，貫串出一個主體脈絡，此即邱貴芬企圖建構的「台灣女性文學史」的論述脈絡。所有的導讀先在《文學台灣》第三十七（一月號）、第三十八期（四月號）刊載，其後則由「女書文化」出版，此點亦深具意義。八月四日，為推展本書正式問世，由女書文化出版社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共同主辦一場座談會，假女書店舉行，題為「如何訴說台灣女性文學史——從《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談起」，由女書店蘇芊玲主持，座談引言人有邱貴芬、范銘如、李元貞、季季。因此，《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其實是邱貴芬（及相關研究社群）對於台灣女性文學史書寫策略的一個重要宣示。

在該書導論中，邱貴芬指出：「《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的結構設計比擬一部文學史，暗示一套台灣女性文學史觀，其一大企圖就是想透過不同撰述者詮釋和觀照的不同來彌補傳統文學史述的單音現象，也想藉由這樣空間化的歷史架構避免單線的歷史線性敘述。集體撰述是《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的一大

特色。」《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的多重批判觀點，一方面鎖定傳統線性史學的單線敘述法則，另一方面也指向既有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男性單音敘述觀點，同時批判國族大敘述化約了女性的聲音。邱貴芬是以性別的批判性思考，反思歷史知識體系建構的諸多迷思。

整體觀之，《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的出版，確實是2001年台灣文學研究場域的一件重要大事，它確實反映了前此文學史論述的諸多問題，也照見了台灣歷史發展的複雜面貌，特別是對於文學史知識體系的性別文化政治等課題，都有深刻的剖析，甚至也間接對「文學史論／國族論述」的激烈論辯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邱貴芬的論述當中，隱含相當多晚近在台灣風行的西方理論，既有靠近於解構史學的斷裂、不連續史觀，也試圖援引現代性、全球化理論做為台灣文學史敘述的分析概念，其詮釋效力固然有待歷史檢證，但無疑是一項開創性之舉。同時，這部書整合了目前能見度較高的女性文學研究者，儼然已經形構出一個新的研究（知識）社群，此種既具分殊性，又具整合性的統整工作，也為日後的台灣女性文學（史）研究投入極具方向指涉性的

能動力。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的多音與複聲，卻似乎埋藏著某種的弔詭性。以該書所整合的研究社群觀之，導論及導讀共計二十二人次（導論一篇、導讀上冊十一篇、下冊十篇；撰寫者十七人，撰寫人次二十二人），其學術身份分別來自兩種學科類門：中文系統（含師範系統國文系）、外文系統（含比較文學系統），其中中文系統占八人次，而外文系統占十四人次，亦即中文系統占三分之一強，而外文系統占三分之二弱，此一研究社群的學術身份來源及其比例配置頗耐人尋味。如果《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的人員配置確實反映出台灣目前女性文學研究的大致圖譜，而這部書的意義又如邱貴芬所言：「結構設計比擬一部文學史，暗示一套台灣女性文學史觀」，那麼，外文系統的研究者主導了當前台灣女性文學史觀的操演鋪展，似乎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以外國語文學系所的學術訓練介入、參與到本地（本國）的當代文學研究，或者甚至隱然形構出某種學術研究社群（知識社群）及研究法則或「典律」（包括議題及方法論的運用），在世界他地究竟是尋常抑或少見？此現象的

成因為何？其對未來台灣女性文學研究可能造成何種衝擊？都有待再密切觀察探究。

與此相對的，2001年台灣各大學博碩士論文中有關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的成果，則呈顯出完全不一樣的分佈概況。2001年台灣各大學博碩士論文中有關台灣女性文學／文化研究的總數（包括詩、散文、小說、其他），比之2000年，確然展現出更繁麗多姿的樣態。2000年的總數為八篇（外加一篇附論）；2001年總數為十五篇，包括二篇博士，十三篇碩士。有意思的是，這十五位博碩士，除了一位為輔大大傳所、一位為文化日研所之外，其餘十三位清一色出身中文系統。對應於前文所論：當前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知識）社群普遍而言是以外文系統為主（主流？）的情況，必將衍生諸多憂慮。

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的既有研究（知識）社群，與新世代研究者的學科訓練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剝離與斷裂。中文系的研究生，自大學以來的學術訓練，中國古典文學必遠多於台灣現／當代文學，而他們的研究主題卻是後者。不僅如此，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們還必須大量援用（大多必須自習）外文系統（或其他學門）所引

入的西方理論，方能符合當前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的學術規格與語言，這對一個出身中文系統的新世代研究者而言，是多重的考驗。樂觀而言，此種現象或許是見證了邱貴芬所謂「多音」的研究取徑，但畢竟是一個非常態的分佈，它反應出當前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的資源分配與權力關係的不均衡。亦即，當前台灣女性文學研究場域已經隱然形構出某種「學術典律」（議題、學術規格與語言），中文所研究生想要在其中完成足可被認同或推崇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具備進入該研究（知識）社群的身份證，必須或者向外尋求外文系師資的指導，或者在中文所的學科訓練之外，自行尋求奧援。至於中文所的教授群們，也由於指導學生做研究的迫切需求，而必須努力向當前女性文學研究的「學術典律」靠近。深入觀察之下，台灣女性文學史書寫的風潮及相關論述，其所衝擊的，未必僅止於文學史研究的性別課題，而是論述場域的形構與知識體系的資源分配與權力關係；其所批判的，也可能是它必須要自我批判的。

2001年，台灣女性文學史論述進入一個新紀元，相關研究（知識）社群隱然形成，文學史觀與書寫策略的論辯也在進行中，《日據以來台灣女

台灣文學評論雜誌 的未來

◎ 劉紋綜

作家小說選讀》的開創性之舉，打開文學史書寫的新里程，各種可能的渠徑都在眼前開展。期望未來台灣女性文學史的書寫，在批判了某些單音敘述與政治正確的「典律」之後，也能夠避免落入新的單音與「典律」之中，進一步開放出更多可能性，尊重更多不同學術類門的訓練，在研究論題、方法論與學術語言各方面，都能跨越單一學術類門的調性，擴大研究社群的含蓋疆域，展現真正「多音交響」的研究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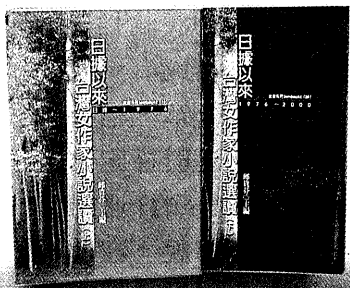


圖 10 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陳程良攝)

前言

思索台灣文學成爲一種民族文學的必要性，使命感並不足以乘載一切。沒有發自靈魂深處吶喊的創作，沒有苦難壓迫下血淚交疊的歷史記憶，沒有來自同一種脈搏的悸動、心靈的交流，就沒有這朵「民族之花」。昔日，作家的身影是一種艱苦卓絕的悲哀，時代的苦難縮成他們筆下一格格的血淚。

支持他們不斷創作的動力，除了不懈的寫作意志，還有來自四面八方「評論」的鼓舞、鞭策、激盪。不論當時的寫作環境多麼嚴寒，藉由評論文字的交流，不僅讓他們得以取暖，更讓他們藉此發光發亮，閃耀成文學史上的一顆星。時至今日，台灣文學邁入學院成爲一門學科。不論從外緣或內緣角度切入的研究比比皆是。

然而，時空轉換，文學評論的角色也脫胎成另一種創作。

我們乘著台灣在時光的洪流中，尋找自身的座標；評論，正是我們在巡弋中的羅盤。

對於作家而言，評論開闊他們的視域，提供一種新的解讀觀點；對於